

地方形态、精神突围与生命重塑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诗歌评述

曾攀

内容提要：新时代以来的少数民族诗歌在地方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现实与自然以及生命与灵魂等层面，开拓出新的境界。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诗歌作品亦可作如是观，其展开了丰富多元的异质性地方书写，寄托少数民族的生活意趣、人文情感和家国情怀，突破已然与已知的精神局限，在未然与未竟之中，以自身的开放性回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情态，书写本不可知却富于创造性的“发生”，由是重塑万物与自我之生命和思想的构型。

关键词：地方形态 精神突围 生命重塑 共同体 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当代中国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诗歌写作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学尝试同样向着不同路径前行，在地方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现实与自然以及生命与灵魂等层面，少数民族诗艺的发展不断开拓新的境界。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诗歌可以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黄芳（壮族）的《落下来》、金荣健（朝鲜族）的《鸟声啾啾鸣东山》（朝鲜文）、牧之（布依族）的《盘江魂》、那萨（藏族）的《留在纸上的心》、张伟锋（佤族）的《空山寂》等五部作品，延续着文学地方性书写的深厚传统，并于新的时代语境中，寄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意趣和人文情感，在江河山岳之中饱蘸家国情怀，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态中重塑生命旨归。

质言之，此五部诗歌作品可以见出自然物、天地人与寻常心的相互交融，并且在与地方形态以至当代中国的交互中，着眼细部的声响以显影世界的多样和多元。其不仅时常直面生活现实与个体精神的困境，寻求突围和纾困的可能，而且这些诗歌更为强调此刻的动身，探询观念之再造与自我意识的重塑，进而构筑一种结构，如罗兰·巴特所言的“任何结构都是可栖居的”^①，尽管这样的结构蕴含着多维度甚至是分化的不同层面，但总体而言，其多浸透于自然的境地之中，沉入历史的深处与现实的罅隙，以求知诸种可能的通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生命重塑的经过是开放的充满未知的历程，诗人的职责便在于探索本身，在未然与未竟之中，求询本不可知的却富于创造性的“发生”。不仅如此，因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

^①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的原则 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①因而好的诗艺必然志在寻得洞察之机与洞悉之道,在更高层面以及更普遍的意义之上,实践艺术的构思并完成思想的构形。

一 细部的声响与世界的显影

黄芳的诗集《落下来》意在进入生活的细处与底部,环绕于人性的周遭而观测之、洞察之。在她的诗中,现实的境况包裹着情感的发抒,呈现出关于罪悔与审判、悲伤与愉悦、分裂与认同、惶惑与澄澈的多重镜像,由此辨析价值的真与伪以及意义的虚与实。《镜子》一诗,亲人的离世引发的情感风暴,无尽的哀婉与无法克制的忧伤不断蔓延,逐渐形成她诗歌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情感结构。相类的诗作如《喑哑》《失眠者》《母亲》《越来越沉默——致父亲》等,“如今我越来越沉默/异乡广场上的影子/又轻又脆,一折便断”^②,在情感最为浓烈的时刻,诗人变得异常的敏感和脆弱,甚至发展出一种虚空的主体,涵纳万物又内心空荡,试图在情思发抒的最后容纳新的形式,并且生成更为复杂的意绪和观念。如桑塔格所言:“诗必须是:精确的、强烈的、具体的、意味深长的、有节奏的、形式的、复杂的”^③。在黄芳的诗中,“我”眼见和思想的层面愈发杂乱,但另一方面却又显得“越来越沉默”,精神的悖论延伸成悼亡者“意味深长的”情感结构。此外,《落下来》这本诗集还常常包孕着极为理性的主体意识,在最为模糊与两难之际,不断延展思绪的触角,因而没有为之所困扰、所牵引,而始终保持清醒,并在最后形成价值的辨析和断定。

金荣健的诗集《鸟声啾啾鸣东山》显影的是诗人故乡的风物人情,《思念化作了白雪》《月牙》等都是饱含深情的歌诗,既有丝丝缕缕的情绪牵动,从个体的亲情和家庭中汲取情感的养份;又常常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穿越日常的琐碎,描述山川河岳的阔大境界。这部诗集“以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温婉的笔触,勾勒出家乡土地上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世间万物无尽的眷恋与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索”^④。诗人对生活始终充满热切的期盼,也对他人与世界怀抱热忱,襟怀旷达,心游万仞。

牧之的长诗《盘江魂》中,同样以地方书写作为全诗的基底,抒情的主体游走于贵州的南盘江与北盘江,“在梦中走近你/要碾碎多少风尘?/你仙雾缭绕的峡谷/有鸟儿轻柔的鸣叫/我的记忆/就会在你的江面之上弥漫而升/拔地而起的感觉/在轮船送别的笛声中/让我深深知道/滚滚盘江东逝水/唯有那南归的雁阵/告诉我故乡的方向”^⑤,通过这首诗可以明晰地感受到,牧之在狂放而不失细腻的抒情中,不断于自我的内部灌注盘江呼啸奔流的涛声。那里既奔腾着对于故乡的眷恋,又常常逾越而出,构筑更深切的关于世界的总体性观察。在诗中,抒情主体将自身投掷于流动的与呼啸的江河:“滔滔江水/漫过我记忆的堤岸/掬一束思绪/把我陶醉的心境放飞/北盘江/你在汉字的墨迹中/留着多少旧日的风景/浪涛中漂浮着多少寂寞的英雄/新燕筑巢的溶洞中/红尘之雨中还有几册诗书与鸟鸣……/在你的浪涛中/明月与星辰,是否仍有/我祖先骚动的灵魂/汹涌的血液/曲径,来自祖先的典籍/我站在你浪涛中的船帆之上/读经读史/无声的风景里/落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② 黄芳:《落下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84页。以下关于黄芳诗歌的引用,均出自该书,仅随文标注诗名,不赘注。

③ 苏珊·桑塔格:《重生:桑塔格日记(1947—1963)》,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9页。

④ 满全、阿布力孜、李惠淑等:《不同的声调,动听的歌——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字获奖作品与获奖译者述评》,《文艺报》2024年8月7日。

⑤ 牧之:《盘江魂》,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页。以下关于牧之诗歌的引用,均出自该书,仅随文标注诗名,不赘注。

日汹涌”。那里充溢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思绪,也升腾起不可触摸的日月和星辰,每一个细部的颤动都带来关于世界的风景和讯息。在《文运萦绕文峰塔》中,“月下吹笛/郎岱的古道马蹄声碎/流水绕过乱石,文笔塔有神灵一样的/从容和缄默,从花间飞回/而风在高空回旋/引领着我们,穿过闪烁佛光的路/在塔与笔之间/放下我们一生的风雨/赎回祖先的青春与梦想”。在这里,诗人不只听到了现下的和远古的声响,更是将视角不断移动,在平移中飞升,以期抵达更为空灵的境地,也见证那个本来难以企及的超拔之界。

那萨的诗集《留在纸上的心》从折叠的与收束的情感信念中渐次展开灵魂之深与厚。《深山老林》一诗常常能够洞察周遭的细微响动,以此构成感觉的触动和思想的契机:“经轮给流水架起了一把阳伞/几头牦牛细嗅彼此的肉身,走向深山/它的迷人在于野果顺着浅显的危机/向林子深处探秘般开辟路径/野草莓红艳瘦小,聚拢在老树墩边/一只虫子从大地深处磕绊而来/在生命的夹缝里顾前盼后/群鸟恪守自我的词语/这未知的声调——/高于生存之上的某种觉知”^①。从中可见,那萨的观察极为细致入微,从万物之形状、色调,一直深入到习性、情态,直至最后的知觉与“觉知”,诗人真正将自我投掷于天地之间,感触鲜为人知的存在,更试图将之勾勒、衍化及升华。《渡鸦》写一群渡鸦于四时与四下纷飞,“在高原淡蓝色的空中起伏嘶鸣/天地喧哗的通灵者,勤奔于山林原野/群落在红色屋顶,这黑色曼妙紧凑的身躯/吞下大地初始的声音/鸣叫不停……”虽是渡鸦,却毫无渺小与局促,它们的身姿唯美却卓尔不凡。虽是山林原野,但通过渡鸦的飞行,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境界也随之扩大。

张伟锋的诗集《空山寂》着眼于“空”字,以空驾有,以虚御实,尝试着与阔大的世界共生共存,自然与个体之间,分享着同样的领地和界域,于是乎可以相互映照,更能彼此补充。《阿拉善》里,“阿拉善草原的风吹过她活着时的脸庞/也吹过她死去之后垒起的新坟//茫茫无边的阿拉善草原,容纳着她的一生/也将容纳她永恒的超脱//完美无瑕的阿拉善草原,未曾想到/我第一次用笔尖触摸你,竟和死亡扣在一起”,不仅如此,诗人还能见证那个与天地宇宙共同镜照中的自我,“黑夜骑着黑马,从阴冷的山谷走过/我抱住一块硬度合适的石头。坐在风中/抚摸它的大小,感知它的质地/念想它到来之前的过去。我要用我的刀尖/在石头的横截面上刻下我的名字——/哦,反着的笔画,就是很多时候/会和你们反着来的我”。正是在如是之联结和往来之中,张伟锋的诗歌往往能够洞悉世间万物的细微声响,知悉它们的动向和归宿。《坠落》中,“坠落的松果,在地上停留着/它从树上来,树从百年前来。回溯往昔/它有着久远的血脉/和沧桑的身躯。但现在,它坠落了/像个胸怀梦想的人,折断了羽翼”。从眼前的松果,了悟历史的久远,也联想梦想的折翼,这是一声悲鸣,当然也寄寓着抒情者的悲悯。

二 此刻的动身与自我的重塑

王德威曾引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在任何一个公民社会里面,我们都期待着讲故事的能量,只有把故事讲好了,承先启后,众声喧哗,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唯一的故事,我们讲很多的故事。”^②不难理解,讲

^① 那萨:《留在纸上的心》,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4页。以下关于那萨诗歌的引用,均出自该书,仅随文标注诗名,不赘注。

^② 张伟锋:《空山寂》,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38页。以下关于张伟锋诗歌的引用,均出自该书,仅随文标注诗名,不赘注。

^③ 具体参见王德威、李维怡、班宇等《当代文学的维度:底层、底线、底蕴——哈佛—岭大学术研讨会文学对谈》(下),《小说评论》2024年第3期。

故事本身既是叙事,也是行动。好的诗歌同样如此,不仅仅是描述与抒情,还可以是行动的召唤,立足此时此刻,也于此地和此在之中,实现对当代生活的关切,也回应远处的召唤,又或完成对于自我的修正和精神的重铸。黄芳的诗歌《自画像》:“是时候转身往回走了/你要带着她/带着这张塞满记忆的旧邮报”,诗人不断自觉时间的存在,并且自知新的“时间开始了”,“如今,万物隐于无形/上坡又下坡,悼词与颂唱/在灰烬里燃起星火/她站在台阶上,成为/黄昏的一部分/黄昏里被风吹起的那部分”(《暮立》)。这是抒情的个体值得铭记和加以怀念的时刻,“有那么一瞬间/生活是一个剥开的洋葱,一束/不合时宜的花/原谅我步履急促/隐藏失控的本能/谢谢你爱上阿普唑仑、失眠以及/尖锐的民谣”(《将来的事》)。在某种无能为力又或难以为继的境况中,诗人总是选择直面以视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无力感与重力感往往共存于深沉而谨严的主体中,同时又反过来映射和对照原我的情状,并投射新的可能径向,终而施以真正的精神突围。

牧之在长诗《盘江魂》中所述及的“此刻”同样令人动容:“此刻,江风一遍一遍吹拂着/柔软的时间,被江水隔离/山崖上的孤枝如母亲的白发/在黄昏之后,在江水退去的地方/与故乡的旧址,惊动那只衰老的橹/那些逝去的月影、传说、号子、驿道……/在我们的极目远眺中,把骨血/归还苍茫大地,把血液倾入江河大海/让我们的虔诚,在史书和圣人的诵经中/留下我们的诗和远方。”不仅仅是时间的延展,更带动了盘江所盘踞的空间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在无限的静止的时间中,有着永恒的骨血亲情和沉默宏博的大地,叠加空间的移变,由是传承了渺远的历史与圣人及其所延续的“诗和远方”。

那萨的诗作通过女性的触角,以细腻、深沉之力,构造反思、重生之书。《遇见·理塘》:“我忍住世间所有情绪,触摸/长春科科尔寺、千年古树、白海螺、黄色墙壁……/白塔公园、预留的上座、穿过时空的妙音//却又溢出这一世的悲喜”,那些极具个人性的细节,通过主体的析解和确认,不断传导“时空的妙音”,并显露出人世悲欢的真容。罗兰·巴特说:“造成声音的东西,正是声音里令我心碎的东西,说它令我心碎,是因为它注定要消亡,仿佛声音永远只能是一个回忆。这声音的幽灵,就是变音转调。一切声音都由音调的变化来限定,而音调的变化,就是正在沉寂下去的东西,是正在分散消失的音核。”^①在个体性、微弱性与不可言说性中,诗歌将一种事物或个体的声音及其转折表达了出来,这个过程当然是曲折的,有时竟是微弱的,张伟栋在讨论“弱的普遍性”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随处可见的是强的普遍性,比如资本与技术的强普遍性,构建了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架构,图像与影音的强普遍性,定义了现实的呈现方式,权力与政治的强普遍性,塑造着历史的格局与走向,诸如此类等等不一而足。一个人无法直接反抗这种强的逻辑,或者反抗则意味着与时代的脱钩,而诗歌守护着弱的普遍性,在强的逻辑之外,以隐喻的算法则。”^②分疏了诗歌的强与弱,制度性的与理论性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并非因其之弱而丧失创造性,而是以另一种强力的方式存在,张伟栋进一步说到:“诗的普遍原理并不是所谓的再现或表现,也不能被单纯定义为创造,而是转化,通过缔造某种诗歌函数将声音转化为韵律,将杂多历史经验转化为纯粹的真实,将过去转化为未来的期待,将微弱的、渺茫的转化为某种至高无上。”^③诗歌以“弱”为本,为出发点 and 基准点,但无论在怎样的位置和情态中,令人称道的诗歌形态都试图抵达某种真理,如是也取消

①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第101页。

② 张伟栋《论弱的普遍性:基于两首当代诗的文本细读》,《南方文坛》2024年第4期。

③ 同上。

了强与弱的简单二元化,向更高的精神层级进发。

张伟锋的诗歌开阔深邃,深情、真挚且神秘,以宁静而精细的笔致,营构出浩大深远之意,洞察自然万物的动静虚实,与此同时不忘凡俗世界的人间烟火。诗人以虚空统摄实在,以空灵召唤繁复,敏锐地发觉时间的游动与空间的张弛,在水滴石穿的思索中求取生活、人性与命运的答案,于无边的空寂里冥想得失、悲欢与伦理。这位佤族诗人的诗作有远方,有世界,有他者,有人心。其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他的大道至简。如《简约术》:“大雪纷飞,梅花盛开/我在树下等一个人//我要请她为我酿造青梅酒/请她为我斟满杯。请她与我一起喝下/时间的佳酿——//我在等一个人。等她替我消除/胸中的远大理想。”抒情的主体甘愿持守于自我的疆域,甚至不排斥庸常地度过短暂的一生,因而可以祛除繁文缛节,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的最原初和最纯粹的状态,其间矗立着一个不断剥离庸俗主义的本真的自我。这样的处境和状态下的主体形态是最坚不可摧也最值得信赖的。不仅如此,张伟锋的诗歌往往能从近处觉知远方,从细微洞悉宏阔或空灵,那些无数的他人都与“我”有关,“深夜,我读着亡者的诗。我们/曾生活在相同的时间段,我们从未相逢/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阅读他的词语和句子,我触摸/他的情感和理智。我在拐弯处,停留片刻/以此看清他的背影,并深刻怀念他”(《夜读》),一无所有的陌生人,未曾谋面却一再相逢,“我”试图与之相交相知,并由此试图复活死去的亡灵,到达世界上那些生僻而不为人知的角落。于是,“我”开始真正进入并理解这个世间和那些难以触及的事物,“把送信的事情交给我,我不怕被拒绝/把分发雨具的任务交给我,我来交付给所有人/——如果有人需要,他们可以取去/如果是多余,他们可以不要,或者拿去之后/丢在风中。而这一切,都合乎情理”,这是张伟锋的《答案之书》,他始终将自我置于外在的他者身旁,与万物和他人同行、相知,经此构筑了总体性的感知体系与情感结构。

可以说,从澜沧江到茈碧湖、勐省河等,佤族诗人张伟锋的诗歌有着极强的地方色彩,南方山水在他的内心激荡,但是组织诗行之际又显得素淡如斯,他出入于云南尤其故乡的河山,行吟,沉思,建筑自我的精神之塔,那里既是避离烦乱悲观的净土,同时又是思索探询后重新出发的腹地。《滂沱词》是张伟锋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全诗十个小节,突如其来的自然之泉涌,灌注人间,也重塑着人世的结界,诗人不得不于焉重思生命的构义,与此同时求索那些共同的困境与命题。滂沱的冲击只是一次对撞的契机,世间万象似乎都开始模糊和再造:“碎裂的碗,在南方的星空下/盛放着星光。在口渴的时候/赶路至此的行人/可以用它接半碗干净的雨水。它换了一种/有用的姿态,继续存活在它所在的角落里/这看上去很平凡,但细想起来/却感觉了不起如大雨般”。诗人思如泉涌,开始注意放肆的自然和人类的悲欢,见证悄然而至的残酷无情,即便是不可回避的不幸和灾难,亦可视作岁月的轮回、生命的坚忍。

三 自然的洞悉和思想的构形

黄芳的诗歌往往从芜杂的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尝试超脱和穿越,以期抵达一种澄明的境地,又通过形而上的喻象和多向度的隐喻,触摸那些难以企及的想象,也试图捕捉难以辨析的真相。诗歌《杀死一只知更鸟》显然是向世界文学经典、美国女作家哈珀·李的同名长篇小说致敬,其中关于审判与宽恕、辩护与沉默、在场与缺席的表达,可以见出此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底色。《悼词》一诗则是向海子致敬,“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但却是关于死亡,关乎纪念与重生。《九月》一诗似乎也可联系朱自清的《背

影》：“这些年/九月建造了多少个陌生小镇/多少个站台不负星辰/手拿橘子的唯一的人，多少次/突然在风中跑起来”。黄芳试图通过唤醒或重建那些远早或近端的传统，在时间的延续性中，缅怀故人的言语行迹，考究事物之当代性的新的起点，与此同时，这也造就了精神的深度及其延伸出来的决然勇毅。《虚构》一诗中，世界再繁杂喧嚣，生命的苦难再难以吞咽，仍不忘存灭不定的星辰大海，“我蹲在街角，向你虚构了月亮和繁星/——它们清澈又闪烁/正照着我回家”。《深海》则关乎每一个孤独的人，进入的是那种独异性的意识和领地，“是否都渴望跟一只海豚亲近/抚摸它调皮的尾巴/任由它天真的嘴在脸上/蹭来蹭去/当黑夜来临/它一个转身，就把你/驮入深海”，这是黄芳关于这个世界及其中不可复制之个体/人群的思想表述，由此她能够听到并知悉人世间的微弱而坚定的存在。

如前所述，牧之的长诗《盘江魂》浸润着民族性与地方性，并大而扩之集中书写江河山川、天地自然，从而不仅在诗歌内部植下丰富的异质性元素，而且在意象和境界上走向了无远弗届的阔大。“不问旅程，你仍然风雨无阻/不惧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江边，全身而退的秋天/在我们的眼前，闪现秋日黄昏的倦色/祖先们的不屈不挠/用盈血的双眸，点燃你岸边的篝火/行走的云朵，掠过你的江面/高原的古驿道，有我们的青春跋涉/山顶的蝴蝶，和依然的花朵/在诉说光阴的故事，而晨雾/正在你的浪尖上，等南飞的雁阵。”牧之对于故土有着真挚甚而近乎狂热的膜拜，诗人将贵州的“盘江”放置于眼前，也化于心中，更重要的是将之熔铸于黔地乃至中华的大地理与大历史之中，盘江之水波澜翻滚，诗人之灵魂也随之荡漾飘移。长诗的五章一气呵成，从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江两岸美、盘江余韵以至盘江之梦，书写盘江之源与流、风雨与灵魂以及目下与未来、现实与梦想等，呈现出磅礴浩大之气象，又不弃置涓涓细流。在牧之的诗里，叙述或抒情，皆为返乡，“远离你，我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其实，在高原/你是我的生命之源/你是我回家的路”，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却又不单单只是为了归来，而是不断回到精神的领地，回到自我的原点，“北盘江/你是伟大的/你的灵魂让我明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就会在高原掀起骚动的高原之风/让大海的浪涛战栗”，经此叩问灵魂的皈依与走向，同时更是自我的重造和精神的锚定。“月光在高原的苍茫里绵延不绝/我们与古寺的一盘残棋对峙/而芸芸众生暗藏的大悲大悟/在聆听祖先们的禅语/一杯香茗，与高僧/在左手执白右手执黑的对弈中/扯一朵白云，携一缕阳光/破解了人间斑驳的天机与人心/玄机转瞬，蛹化成蝶”，历史的声音使人们了悟，逝者如斯夫的江水，昼夜不舍，我们发现自然与祖先的过程，也是主体内部重建的经历。那些遥远的或近处的“他”者，不断构成这片土地和那条江河的鉴证，如此映射着那些焦灼地渴望得到精神滋养的当代个体/群体。“在打铁关/呼一口大地的灵气/便有青铜与青铜撞击的故事映出/远播到千里万里/仰望打铁关/我们在寻思中获得顿悟/我们在顿悟中得到启迪”，思想在顿悟的刹那不断构形，超越俗世的框囿，又探寻而求得遥远而伟大的精神资源。

那萨对自然世界与天地宇宙保持着一种侧耳倾听的姿态，率真而素质，因而她能够“听见生命”，也可以“听见爱”“听见来世的花/在夜间绽放”（《听见绽放》）。她对世界始终怀抱谦恭乃至谦卑的姿态，那是她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爱，她致以雪山和神灵的崇高的敬意。因而她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值得玩味的是她见树木兼见天地，“看一棵树，看它身后的天空/无限广阔，看夕阳对永恒的保留/看它枝干间的纹路，纹路里荡起的波浪/一阵阵，果实蓄藏自由的风，暮霭向晚/关乎收割的事，大地并无荒凉/雀声

绵绵,确切地说/一棵树与一个看客/既无别离也无真正的相逢”(《树》)。从天地还能见人间,看到其中的相对与永恒,此为另一种信仰,在这样的精神序列中,诗歌获致了新的意义系统,也于独特时空中践行着非同一般的经验价值与生命历程。

相较而言,张伟锋能够在喧嚣与芜杂中排空思绪,如此既是穿透,亦为超脱。《在云南》强调灵魂之间的互访,而不拘泥于俗世中的庸碌,甚至于浊浪滔天中排清精神的毒素,塑成纯粹素净的诗思主体。只有在这样的空寂之中,而且是在更深层次呈现出饱满形态的个体,才能真正与无数的他者和无尽的自然世界对话。《池鱼》一诗:“热爱自己的时候,也敬畏周围的事物/我们多撒一把食料,让它们能在冬天吃饱/就不在春天里挨饿。”不仅如此,外在的天地自然,还可以反过来抚触与疗愈抒情的主体:“我曾几次说起,要在夜里/在江边听一听水流的声音。可时至今日/几个年头流逝了,我都没有迈出脚步/——我想安静一会儿,借着宁静的夜色/让高高的天空,尽量压低我莫名的伤感”(《夜色变深了》),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内部对话,在他我一体中实现深层的沟通,形成互识与互助的结构形态。《化念》一诗里,“渴望远行/一个人去山中,化念/借流水的慈悲,滋养万物/借月光的开阔,销蚀坚硬”,这是一种认识和辨知自我的复杂过程,也是个体精神不断行进的印证。雷平阳称张伟锋是“突围者”,“在我的观念中,他是一个寂静但又怀抱着火焰的诗人,佉族的歌诗血统决定了他诗歌古老的抒情气质,而他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虔信又将他的诗歌引向了冥想与宽阔——在语言、思想、审美等诸多领域,他都将自己的身份确定为一个突围者,试图站在阿佤山上看清整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也试图让自己出自阿佤山的吟唱能感动整个世界”^①。面对无处不在的内外障壁,诗人除了突围别无他法,这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姿态,甚至于以正面强攻的方式进行种种穿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伟锋诗歌中,还有一个自我的守卫者形象,一个人也许不可能去护卫更多的外部,但是起码能够重整内心,完成精神的守持,不庸人自扰之,对世界与他人虚怀以待,如《空白》:“写一首诗。在精彩处/留下空白,或者跳跃。被迷住的人/会继续往下想。没有兴趣的/会擦身而过。我已经不喜欢争辩/我已经习惯语言缓慢/在不合适的观点碰撞中,抽回自身/独自行路。这像一次/贴近哲学的行为,但其实不是/我是个逍遥的行者/也只愿意这样,永远地下去。”张伟锋常常在诗中进行一种“逍遥游”,有时是现实所迫,但更多的是主体态度,在进与退、爱与憎、怀疑与相信以及犹疑与突围中,诗人以精神之强度和思想之厚度,完成了自我生命的重铸。

结 语

综上所述,从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诗歌获奖作品可以见出,少数民族诗歌本身所构筑的独特性,其一是因诗人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具有显明的地方色调,那不仅是作为地缘的存在,在物产和地理上具有鲜明特色,而且也常常意味着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化建构;其二是抒情主体的蜕变以及自我意识的形塑,如霍俊明所说:“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可以见出,少数民族诗歌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的狭小界域,而是将写作作为精神突围的重要形态,以履行内部的道德律和新的伦理形态;其三则是对于宏大历史与当代社会的观照,这些诗歌基于“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以构筑自身的“精神向度和文化

^① 雷平阳:《序》,载张伟锋《空山寂》,第1页。

载力”^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文学层面的重要呈现，“不仅为全球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加入了中国的元素，而且也从中国的另类现代性视角对这一长期以来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话语予以了解构”^②，不难判断，这是在构筑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这样的诗学尝试显得尤为可贵。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所形构的文化共同体，在不同的语言形态和文字表达中，呈现出中华民族的百花齐放。

张伟锋的诗集《空山寂》中有一首诗《重活》：“你去空山，去枷锁/消戾气，碎身体里的岩石//你从空山回，携苍老/带诗歌，纳藏活着的气息”。诗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和意义上的重生，由虚构出入实在，以空寂映照繁复，“空山之寂”对于诗歌而言既是景观与自然，更是境界，是思想本身。正是在空无中的填慰，在寂寥之中捕捉“活着的气息”，尔后才能穿越芜杂凌乱，才能透视浮华遮蔽，进而拨云见日，既而重获新生。

（曾攀，《南方文坛》杂志社）

【责任编辑：周翔】

① 霍俊明：《宏阔之境与发现之光——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述评》，《文艺报》2024年8月7日。

② 王宁：《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